

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AUF EWIG IN HITLERS SCHATTEN ?

永远活在希特勒
阴影下吗？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著

丁君君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 生活 译 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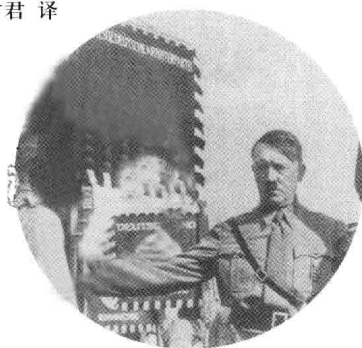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永远活在希特勒 阴影下吗？

关于德国人和他们的历史

[德]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著

丁君君 译



AUF EWIG IN
HITLERS SCHATTEN ?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AUF EWIG IN HITLERS SCHATTEN? by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2nd ed. 2010
© Verlag C. H. Beck oHG, München 2010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关于德国人和他们的
历史 / （德）温克勒著；丁君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6

ISBN 978-7-108-03640-7

I. ①永… II. ①温…②丁… III. ①德国—近代史
②德国—现代史 IV. ①K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360 号

责任编辑 史行果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前 言

德国人会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相较于二十年前，本书名提出的这一疑问已不太被人提及。在1986年的“历史学家大争论”中，我曾发表过一篇与本书同名的文章，讨论纳粹屠犹行为的独一无二性。这篇文章也被收入了本书中，并附有一篇我十年之后续写的回顾。1996年我思考的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真的只有保守派在宣扬“历史政治”吗？我们这些（自诩为左翼民主人士的）批判右翼修正主义分子的人，在言谈和写作中是否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时至今日，“历史政治”的概念早已变成了一个流行词，据我所知，这一概念最早是出现在“历史学家大争论”中（当年我在文中也使用过），为的是警示出于政治目的将历史工具化的危险。

两德统一并没有驱散希特勒的阴影，也不会驱散。“二战”结束四十年后，犹太人大屠杀才以其真正面目被德国人的集体记忆所承认，这一真面目是：大屠杀是20世纪德国历史中的核心事件。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大争论”才是一种必须之举。因为争议的真正主题是德国犯

下反人类罪行的历史地点，而触发争议的则是某些将欧洲犹太人大屠杀行为相对化的尝试。

两德统一后的头十年里，奥斯维辛的话题无疑变得越来越棘手，越来越可怕。部分左派以犹太人大屠杀为名斥责联邦政府参与以维护人权为目的的武装行为。1999年，在派遣联邦军去科索沃的问题上，红绿党的联邦政府却倒打一枪，声称：正因为有奥斯维辛的历史，德国才更应义不容辞地对巴尔干进行军事干涉。

自此之后，犹太人大屠杀的话题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这是一种进步，因为任何一种对这一罪行的工具化都会逐步走向庸俗化。面对历史，负责任的做法应是致力于如何在当下为负责任的行为创造条件。从这一考虑出发，需要做到两点：其一，德国人不应该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止步不前；其二，德国人不应把犹太人大屠杀视为历史中的唯一合理教训，夸大看待某些政治决策。

回顾过去几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在统一后的德国，纳粹时代依然是一个被回避的话题。1933年之前的历史未必直接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却为这一事件及其后果创造了前提条件。本书收录的多篇文章正是以此为讨论对象，从18世纪开始，探讨当时对德国后世影响深远的自由和专制体制。

除了1933年和1945年，目前德国回避的话题中又多了一项内容：1989—1990。直到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即两德统一之日，困扰人们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才堪称真正得到了解决。为什么会这样？“德国问

题”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本书中某些文章思考的主题。这些文章着眼的并不仅仅是德国历史，还有作为德国历史参照体系的欧洲的历史和整个西方史。只有放在这一体系中，衡量德国近代历史的标准才会明晰起来：那是西方世界的标准，历史中的德国一度是西方的一分子，德国参与构建了西方世界，却不止一次地游离于西方之外，最后一次游离引发了世界史的一场大灾难。

本书中的文章基本都曾发表在日报和周刊上。笔者针对的对象并非专业人士，而是更广泛的、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群。某些观点和引文因其提纲挈领的意义在书中重复出现了多次，一些直接引用的出处在注释部分都有注明，但因为篇幅原因未能概全。如果读者们对本书探讨的课题有深入了解的兴趣，容我推荐大家参考我编写的19、20世纪德国史（两卷本），书名为《迈向西方的长路》（*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2000年由C. H. Beck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已重印到第六版。

2007年3月，柏林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目 次

前言	1
一 普鲁士的革命只能造就国王	1
二 1848 年：艰难的革命	11
三 一位容克革命家	19
四 刺杀事件和不在场证明	29
五 反革命的革命	40
六 对内战的恐惧	51
七 被压制的罪责	59
八 千疮百孔的进步	75
九 1923 年：魏玛濒危	79
十 兴登堡——德国的灾难	90
十一 可避免的灾难	99

十二 沦陷之后的逆转.....	112
十三 融入西方.....	128
十四 柏林的巴士底狱.....	141
十五 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	151
十六 反面观.....	161
十七 11月9日.....	167
十八 波兰的解放和德国的统一.....	171
十九 矛盾的记忆.....	187
二十 什么是西方价值共同体?	200
名词缩写表.....	224
人名索引.....	225

一 普鲁士的革命只能造就国王^{*}

10

一个国家的没落之路

普鲁士的正式解体非常短促。1947年2月25日，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布第46号法案宣布解散普鲁士，理由是“（普鲁士）一直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载体，事实上它早已不复存在。”^{〔1〕}后一句话的争议性较大。在普鲁士的解体时间上，其实存在着很多不同看法：有认为是1932年7月20日的“普鲁士政变”，当日总统兴登堡（Von Hindenburg）颁布了一条紧急令，宣布解散总理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领导下名存实亡的普鲁士邦政府，并任命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为联邦专员接管普鲁士。有人认为是1933年2月6日，纳粹党以“稳定”名义解散了普鲁士邦议会。也有人认为是1945年5月8日，即德意志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

^{*} 《法兰克福评论报》，2001年1月18日。

〔1〕 Ingo von Münch（主编），《分裂德国的文件》，斯图加特，1976年，第54页。

普鲁士“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载体”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据称米拉波伯爵（Mirabeau）说过：“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相反，它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国家只是军队的驻扎地而已。”^{〔2〕}事实上，这句话出自 18 世纪的德国军人作家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贝恩霍斯特（Georg Heinrich von Behrenhorst）之口。在 18 世纪，几乎所有集权制国家都是军事政权，普鲁士则首当其冲。18 世纪中期，奥地利每六十个人中有一个士兵，而在普鲁士，每十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士兵。

- 11 普鲁士的军事倾向并不仅仅是统治者的秉性所致。普鲁士公国曾由德意志骑士团统治，1618 年，公国继承权落到了霍恩索伦家族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身上，当时的普鲁士虽然东接梅梅尔，西至莱茵河，却没有完整的国家领土。因此普鲁士对外来侵略和军事安全的担忧尤为强烈。1701 年 1 月 18 日，在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的认可下，大选帝侯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在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的国王”，此时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势力还不够强大，但已迈出了成为强权大国的关键一步。

德意志强权

在第一任霍恩索伦家族国王的孙子——弗里德里希二世

〔2〕 Rudolf von Thadden, 《质疑普鲁士——一个被解散国家的历史》，慕尼黑，1981 年，第 58—59、167 页。

(Friedrich II) 的统治下，普鲁士终于崛起为强权大国，当时的德意志地区有两个大国，另一个更为古老的势力是奥地利。和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同，直到 18 世纪晚期的瓜分波兰事件，柏林的霍恩索伦王朝几乎只统领德语区。哈布斯堡信仰天主教，霍恩索伦王室则信仰新教。而勃兰登堡普鲁士国王之所以选择信仰新教，其间有一个关键因素：1613 年，选帝侯约翰·希吉斯蒙特（Johann Sigismund）从路德教改信了改革后的新教。

一个统治着路德信徒的加尔文信徒：正如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阿尔弗雷德·米勒-阿玛克（Alfred Müller-Armack）在 1941 年所言，这是“世界史上一次独一无二的结合”。^{〔3〕} 1905 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发表了探讨加尔文教和“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论著。秉承着韦伯和历史学家奥托·辛策（Otto Hintze）的思路，米勒-阿玛克也试图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普鲁士现象：加尔文教精神为统治者赋予了政治活力，而被统治者则具有路德教的顺从精神——在霍恩索伦王朝的政权中，两者发生了历史中唯一的一次碰撞。 12

如果普鲁士真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政权，它其实很难崛起为强权大国。事实上，早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土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统治下，集权的霍恩索伦王朝在欧洲已被视为政绩显赫的典范。其实就统治手段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强权政策和其他集权国家并无显著不

〔3〕 Alfred Müller-Armack, 《经济风格谱系——18 世纪之前的国家经济形式的思想来源》，斯图加特，1941 年，第 141 页。

同，这位普鲁士国王最突出的特点是对风险和资源的武断权衡。弗里德里希二世 1740 年登基时，勃兰登堡普鲁士还只是一个领土分散、统治混乱的国家。此后弗里德里希肆无忌惮地发动了多次战争，最后却只因为一个历史的偶然才得到拯救，即“勃兰登堡家族的奇迹”：1762 年 1 月，弗里德里希最危险的敌人——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去世了。在七年战争的危机中，弗里德里希表现得可圈可点。然而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传奇，是因为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政策最终取得了成功。也正因此，他的榜样才为后世带来了极大灾难。

如果弗里德里希只是一位单纯的军事统治者，他也不可能得到“大帝”的称誉。在当时的欧洲，弗里德里希的确具有代表性，然而他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和开明的集权统治。自上而下地贯彻理性：这一理念和其他集权国家的“唯我独尊”有根本上的不同。早在弗里德里希的统治时代，“Travailler pour le roi de Prusse”——“为普鲁士国王而工作”，已有“为自己而工作”的意义。当然这些工作应符合国家利益，必须是理性行为，住在无忧宫里的哲人国王——国家的首席仆人，似乎也在以身作则。

13 “让德国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并不是其反动，而是其进步。”——1947 年，历史学家鲁道夫·施塔德尔曼（Rudolf Stadelmann）提出了这一极具矛盾性的说法，以此解释德国为何没有发生成功的革命。^{〔4〕}施塔德尔曼的“进步”指的

〔4〕 Rudolf Stadelmann,《德国和欧洲革命》，劳普海姆，1948 年，第 11—13（28）页。

是开明的集权统治和弗里德里希的个人作风。柯尼斯堡的依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纯粹—实用理性批判哲学家——虽然不赞成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但一直对法国大革命赞许有加。然而就开明的集权政治而言，连康德也认为，只有通过“国家智慧”，即自上而下的革命才能实现。因此他的呼吁并不是面向民众，而是面向开明集权的国家。^{〔5〕}

国家最终听从了康德的呼吁，但为时已晚——1806年至1807年，普鲁士在拿破仑大军前遭遇惨败。此后，两位普鲁士的外邦首相——拿骚男爵卡尔·冯·施泰因（Karl vom und zum Stein）和汉诺威侯爵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先后进行了政治改革，改革虽然没有取消集权制，却唤醒了社会力量，以至四十年后的1848年，在这些社会势力的强烈要求下，普鲁士举行了第一届邦议会选举。就这样，普鲁士变成了一个宪法国家：这是1848—1849年德意志革命的寥寥成果之一。

普鲁士的阴影

德意志革命并没有达到其两个主要目标，即统一和自由。二十年后，俾斯麦实现了其中之一，其手段是对奥地利和法国发动战争，因为这两国是统一之路上的障碍。然而俾斯麦没有解决自由问题，也无力解决，因为议会制度违背了

〔5〕 Immanuel Kant, 《关于永恒的和平——一个哲学方案》，汉堡，1959年，第115—169（154）页。

老普鲁士、王朝、容克地主和军队势力的利益。但至少，俾斯麦一步一步地为男性国民争取了平等的议会选举权，先是在1867年的北德意志联盟，后在1871年的整个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创建之所以被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俾斯麦的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这种称法，俾斯麦本人或许也没有异议。1862—1866年间，普鲁士和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在宪法问题上的冲突达到顶点，拿破仑三世警告俾斯麦普鲁士将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俾斯麦则答道：“在普鲁士，革命只能造就国王。”〔6〕

直到1918年10月，“一战”的失败已成铁定时，德国才成立了议会政府。政权的议会化也有一定的“自上而下革命”的特点。如果从前的普鲁士真心支持宪法改革的话，或许帝制也能得到保留。然而他们没能做到，因此德国人在11月推翻了德国帝制，推翻的对象也包括霍恩索伦家族。

共和国虽然宣布成立，普鲁士建制却继续保留了下来。保留建制的目的是为了凝聚国家的东西地区，防止可能发生的分裂行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普鲁士和之前世界认识的普鲁士截然不同。作为德意志史上最大的邦国，普鲁士逐渐发展成为德国民主制最坚实的后盾。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左翼自由德国民主党在普鲁士共同执政，并以此证明，只要执政党既有政权意识又有妥协精神，议会制也能行得通。魏玛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首席理论家”鲁道夫·西尔

〔6〕 Fürst Otto von Bismarck,《俾斯麦全集》，柏林，1924年，第149页。

弗丁 (Rudolf Hilferding) 说过: “普鲁士是共和国地盘上的骄傲堡垒, 我们的任务是将它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骄傲堡垒。”西尔弗丁曾两度被选为财政部长, 此番话是他 1929 年在基尔的社会党会议上的发言, 这段 “黑红金” 的普鲁士宣言当时为他赢得了满场掌声。^[7]

然而到了 1932 年, 连普鲁士的选民们都以多数票否决了民主制, 于是 “骄傲的堡垒” 也随之崩塌。在多数派面前, 民主已无回天之力。事实上, 如果当时的总统兴登堡最终坚持阻止纳粹掌权的话, 以德国总统的权力, 宪法制依然可以得到保留。然而兴登堡受到了身边最亲近的顾问和朋友们的压力, 其中包括易北河东的骑士贵族势力的著名代表, 这些人希望通过让希特勒参政的方式来 “驯服” 他。1933 年 1 月, 兴登堡终于让步了。很早以来, 共和国的普鲁士遗老势力一直在努力取消魏玛民主制。1933 年 1 月 30 日, 他们的奋斗 “终成正果”: 希特勒的议会内阁中, 保守派成了多数派。

七周之后, 即 1933 年 3 月 21 日, 兴登堡和希特勒在波茨坦的迦尼瓮教堂共庆 “老派权贵” 和 “新生力量” 的结合,^[8]起因是新选帝国国会的人会议式, 这一新选议会将通过为帝国政府授权的法令。当年迈的元帅兴登堡独自下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墓室中, 与国王进行沉默的对话时, 很多德国人心中都涌动着同样的爱国主义情感, 此前只有 Ufa 拍

[7] 1927 年在基尔举行的社民党党代会, 会议记录第 180—181 页。

[8] 《舒尔特海泽的欧洲历史日历》, 第 74 卷 (1933), 慕尼黑, 1934 年, 第 62 页。

摄的关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电影才能达到这种效果。然而“波茨坦之日”并没有复活老普鲁士帝国。新的执政者只是利用了老普鲁士的神话，为自己的政权赋予比 1933 年 3 月 5 日的成功获选更高的合法性。

如果没有利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神话，奥地利的天主教徒阿道夫·希特勒很难让德国人追随自己十二年。然而这个神话只是无数神话中的一个，效果并不明显，就像早前的帝国神话让德国人相信自己是历史的受命者，要领导整个欧洲，保护西方不受反基督徒（布尔什维克人）的侵犯一样。代表老普鲁士势力的军方、外交和高层势力虽然对这位新秀领导颇有微词，但当他们看到希特勒一步步地为德国洗清了 1918 年的败战耻辱后，也不由欢欣鼓舞。这些老派精英并不想和英法动武（希特勒本人也想避免与英国作战），因为这样的战争很可能扩展成为世界大战，但他们毫不反对将战争作为扩张德国势力的手段。这些深受威廉二世影响的精英对攻打弱勢的波兰毫无异议——毕竟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夺回属于德国自己的土地，并同时彻底消除波兰的威胁。当然，在保守派眼中，希特勒发动的最合情合理的战争就是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战争。

普鲁士的反抗

直到人们彻底打消了对纳粹政权的反动性质和犹太种族灭绝行径的怀疑之后，以普鲁士势力为主的保守派才开始对

希特勒发动大规模抵抗运动。此后，众多普鲁士背景的军官、地主和公务员在良心的号角下奋不顾身，死而后已。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对于某些参与者而言，也是对自身罪责的一种纠正。勇于参与此事的人，是需要一份道德感支持的。

“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十周年纪念过后不久，它已成为了联邦德国的一种“起源神话”。来自贵族、军方和教会的抵抗运动已变成针对希特勒本人的抵抗运动。在“7月20日事件”被视为德国宪法的铺垫行为之前，保守派反对党在当前和未来的政治方针上存在的不合民主之处，都被粉饰一新。在保守派看来，对希特勒的抵抗运动拯救了普鲁士的荣誉。若论起普鲁士在20世纪的角色，那么人们应该回忆的是这次事件，而不是老普鲁士在推翻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掌权过程中的贡献。¹⁷

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也“发掘”了普鲁士。1980年，在昂纳克（Honecker）的要求下，菩提树下大街上重新竖起了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骑士雕像——雕塑家克里斯蒂安·丹尼尔·拉乌赫（Christian Daniel Rauch）的作品。在此之前的一年，英格里特·米腾茨威（Ingrid Mittenzwei）出版了一本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传记，这本传记对这位霍恩索伦家族国王的一生作出了新的判定，肯定了其执政的进步性。1985年，恩斯特·恩格尔贝格（Ernst Engelberg）——他和米腾茨威一样，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其《俾斯麦传记》的第一卷，恩格尔贝格在书中将德意志的统一阐释